

ZHONGGUO GUDAI WENREN JITUAN YU WENXUE FENGMAO

中国古代文人集团 与文学风貌

郭英德 著

天山積雪
乙亥秋月
郭英德書於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 从文人集团的构成方式和文化功能的角度审视中国古代文学
- 深刻认识中国古代文学的依附性、集团性和规范性等特征
- 从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的关系的角度审视文人集团
- 全面阐释文人集团的文化地位与文化意义

中国古代文人集团 与文学风貌

郭英德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郭英德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11

ISBN 7—303—04692—5

I. 中… II. 郭… III. ①作家—中国—古代②文学流派—研究—中国—古代 IV. I 209.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第 10201 号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875 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出版人: 谢维和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7.875 字数 187 千字

1998 年 11 月第 1 版 1998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5 000 册 定价: 10.80 元

引 言

集团是为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共同行动的社会团体。

一个集团的人数可多可少。俗话说：“三人成群，五人成伙。”在社会活动中，但凡三人以上的组织，就可称为集团。

《三国志演义》小说第一回，叙刘备、关羽、张飞邂逅于河北涿县，情投意合。于是在桃园中，备下乌牛白马祭礼等项物品，三人焚香再拜，共立誓言说：

“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誓毕，三人互拜，以刘备为兄，关羽次之，张飞为弟。刘、关、张三人就形成一个集团，这个集团后来成为刘蜀王国的核心。

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作为一种有组织群体的集团，与无组织群体的群众、集合体等，是迥然不同的。集团的构成有三个基本条件：

第一，集团中的每个成员都有共同的社会活动的目标。刘、关、张集团的目标，就是“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

第二，集团在实体上必须构成一种现实存在的组织，在这一组织中的人们之间有一种十分确定的因缘关系，如血缘、地

缘、业缘等社会关系。刘、关、张三人虽然异姓，却互相序齿，结为兄弟，他们所构成的是一种结义兄弟的组织。

第三，集团中的人们在精神上必须有一种十分鲜明的集团意识，也就是说，集团中的人们之间有一种十分突出的集团心理，即“同调”、“我们”、“咱们”、“大家”之类的心理状态。刘、关、张三人立誓：“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这就是他们的集团意识和集团心理。后来，他们果然为了实践这一誓言而不惜赴死。

在以上三个条件中，第二个条件是最重要的，即集团必须是一个实体组织。持此以衡，集团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以血缘、地缘为关系的基础集团，如家族、民族、村落、街巷等；一类是以业缘为关系的职能集团，如国家、政党、军队等政治职能集团，工厂、商店、公司等经济职能集团，和学校、教育、社团等文化职能集团。

本书所讨论的中国古代文人集团是一种文化职能集团，它是由知识阶层通过一定的社会关系，为了一定的目的组织起来进行文化活动的社会团体。

作为一种文化职能集团，古代文人集团归根结底是社会分化的产物。而社会分化则是由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诸种原因共同作用的结果。

在社会上，人的经济地位的差别形成了彼此间的阶级差别，而同一阶级内部由于经济的、政治的、职业的原因继续产生分化，则是阶层分化。中国古代的知识阶层在经济上并没有形成完全独立的阶级或阶层，在政治上又是属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一个中间阶层，因此它主要地是社会的第二次分化即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化的产物，是以专门掌握和传播知识、从事精神劳动这种职业作为构成社会阶层的基本特征的。

正因为如此，在一般的意义上，由知识阶层结合而成的古代文人集团，其主要活动领域只能是在精神文化领域中。

但是，由于在中国古代政治与文化就像连体婴儿一样难解难分，既没有脱离于政治的文化，也没有不渗透于文化的政治。因此，和西方的文人集团往往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化职能集团而存在与活动不同，中国古代的文人集团往往兼具政治的和文化的双重职能，同时在政治领域与文化领域中纵横驰骋。

中国古代文人集团发端于先秦诸子学派。当学术从官府下降到私家的时候，当士阶层崛起而立，形成一个新的文化实体的时候，诸子学派就脱颖而出，成为中国古代文人集团的原始形态了。这种学术性的学派，从先秦一直到清代，都是文人集团的一种重要类型，可谓源远流长。而且，学派往往在特定的环境下，派生出其他类型、尤其是政治性的文人集团。例如，宋代二程的洛学和苏轼的蜀学，就导致政治上洛党与蜀党的明争暗斗；明代的东林学派，最终发展成为东林党等等。可见，中国古代的学派是很难保持其学术性的贞操的，它每每在文化传统的感化下，不由自主地或自觉自愿地和政治野合。

在秦汉大一统的专制帝国建立以后，先秦士阶层所拥有的广阔的社会活动天地已不复存在了，知识阶层更多地只能凭借他们的文学才能，来博取帝王诸侯的青睐和宠用。于是，侍从文人集团就应运而生，文人或则依傍于宫廷，或则优游于诸侯，以诗词歌赋歌功颂德或抒情讽喻。这种侍从文人集团几乎历代皆有。它是政治性的集团，因为它必须仰赖帝王诸侯的鼻息，否则便如无根之木；它也是文学性的集团，因为它的活动只能局限于吟诗作赋、操笔染翰这个狭小的园地里。

比较纯粹的政治性文人集团，无疑要数文人组成的朋党了。这种文人朋党是在东汉末年出现的。它的出现标志着文人作为一种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登上了政治舞台，并将发挥其重

要的政治功能。本来，朋党只是统治阶级内部权势集团的政治结合，文人只能依附于一定的权势集团而难以独立。现在，文人居然开始凭借其特有的社会关系，如太学师生、进士同年、书院师生等等，逐渐组成政治朋党，在社会政治舞台上扮演起重要的角色来了。这种文人朋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现代政党的萌芽。

比较纯粹的文学性文人集团的出现，还要比文人朋党更晚。因为要使知识阶层心甘情愿地龟缩于文艺一隅，仅仅在这里展示自身的才华，实现自身的抱负，这在情感上和理智上并不是那么容易接受的。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壮志豪情^①，到“文章者，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曹丕《典论·论文》）的明确信念，文人在人生价值观上毕竟需要有一个漫长的转变过程。

因此，直到魏晋南北朝这一“文学的自觉时代”，文学集团方始滥觞，如建安七子、竹林七贤、竟陵八友等等。到了中唐至北宋，才有文人结社和文学流派的先后涌现。的确，正是从中唐开始，文人士大夫越来越普遍地把政治追求和世事纷争看作“蜗争角斗”，于是越来越自觉地陶醉于“庭院深深”之中，辗转于“壶中天地”之内^②。因此，借结社以同气相求、诗酒风流，倡流派以门户角立、党同伐异，便成为宋以后文人士大夫十分时髦、乐此不疲的文化活动了。文人士大夫全力以赴地在文艺上讨生活，促使宋以后的文坛繁荣兴盛，历久不衰。

总起来看，中国古代的文人集团基本上有这么几种类型，

① 《礼记·大学》：“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② 王毅：《园林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557～558

即侍从文人集团、学术派别、政治朋党、文人结社和文学流派。它们像一座座璀璨的星群，在中国文化的广袤天空中闪闪发光。

由于篇幅所限，本书不可能对上述各种类型的文人集团作详细的描述和深入的分析，而只能着重阐释它们各自的构成方式和文化功能。我认为，对文人集团作功能性的分析和诠释，应该对我们了解中国文化和中国社会能有更多的启迪。这个视角也更切合本书的研究对象本身，因为文人集团不就是一种政治—文化职能集团么？

在论及文人集团的文化功能时，本书特别提出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的关系这一课题来详加分析。这主要是出于这样一种考虑：在文人集团的诸种文化功能中，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的关系显然是最引人注目的。这不仅因为在文人集团的活动方式中，文学创作无疑占据着显要的地位，也不仅因为文人集团的活动本身，常常决定或制约着一个时代的文学风貌；而且，这还因为中国古代文人集团的文化特征和文学风貌的基本特征，是陈仓暗渡，潜相交通的。

从文人的构成方式和文化功能的角度审视中国古代文学，我们将会对中国古代文学的依附性、集团性和规范性等特征，获得更加深刻的认识。同样的，从文人集团与文学风貌的关系的角度来审视文人集团，我们也将对文人集团的文化地位与文化意义，获得更加深刻的认识。

北宋人刘挚训诫子孙，常常说：“士当以器识为先，一号为文人，无足观矣！”（《宋史》卷340《刘挚传》）话虽这么说，中国古代的士，在唐宋以后，有几人不是冀望以文章名世，以文章传世的呢？既称为文人集团，便不能不更多地文学上讨生活，在精神上求慰藉，难道不是这样吗？

目 录

引 言	(1)
-----	-----

第一章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文人集团发生的文化机制	(1)
---------------	-----

第一节 “道术将为天下裂”

——从学在官府到学在私家	(4)
--------------	-----

第二节 “无恒产而有恒心”

——士阶层的崛起	(10)
----------	------

第三节 “率其群徒，辩其诂说”

——诸子学派的社会活动	(18)
-------------	------

第四节 “悉召文士，以兴太平”

——“焚书坑儒”杂说	(23)
------------	------

第二章 “主上所戏弄，倡优畜之”

——侍从文人集团说略	(29)
------------	------

第一节 “设天网以该之，顿八紘以掩之”

——从梁园宾客到言语侍从	(31)
--------------	------

第二节 “宣上德而尽忠孝，抒下情而通讽谕”

——侍从文人集团的文化功能与文学风貌	(40)
--------------------	------

第三节 “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	
——竹林七贤附论	(50)

第三章 “以径路之殊，成门户之异”

——学术派别漫评	(57)
第一节 “传业者寝盛，支叶蕃滋”	
——学派的构成方式	(59)
第二节 “文以理为主”	
——学派思想与文学风貌	(71)
第三节 “道本大公，各求其是”	
——学派纷争与文学风貌之一	(81)
第四节 “以相长之异而成相胜之气”	
——学派纷争与文学风貌之二	(93)

第四章 “讽议朝政，裁量公卿”

——政治朋党综论	(103)
第一节 “共为部党，诽讪朝廷”	
——太学集团与文学风貌	(105)
第二节 “情义相得”，“奋私昵党”	
——进士集团与文学风貌	(115)
第三节 “广联同志”，“讽议朝政”	
——讲学集团与文学风貌	(125)
第四节 “天下翕然，以臧否为谈”	
——党争与文学风貌	(133)

第五章 “以文会友，以友辅仁”

——文人结社浅识	(145)
第一节 “诗酒风流”，“寄兴适情”	

——文人结社的源起与演进·····	(147)
第二节 “或赓歌酬诗”，“或辩理诂义”	
——文人结社的类型及其活动·····	(155)
第三节 “野之立社，即朝之树党”	
——文人结社的文化功能·····	(166)
第四节 “以同声相引重”，“以悬书示人”	
——文人结社与文学风貌·····	(173)
 第六章 “先有并时之羽翼，后有振起之魁杰”	
——文学流派摭谈·····	(181)
第一节 “预此宗流者，便称才子”	
——文学流派的滥觞·····	(183)
第二节 “诗派之别，源远乎哉”	
——文学流派的形成·····	(188)
第三节 “门户各立，流派纷然”	
——文学流派的展开·····	(195)
第四节 “诗是吾家事”	
——文学流派与文学风貌·····	(203)
 结 语 文人集团的文化意义·····	 (215)
 主要参考书目·····	 (233)
 后 记·····	 (236)

第 一 章

“天子失官，学在四夷”

——文人集团发生的文化机制

- 第一节 “道术将为天下裂”
——从学在官府到学在私家
- 第二节 “无恒产而有恒心”
——士阶层的崛起
- 第三节 “率其群徒，辩其谈说”
——诸子学派的社会活动
- 第四节 “悉召文士，以兴太平”
——“焚书坑儒”杂说

中国古代的文人集团发生于先秦时代。文人集团的发生，决不仅仅基于某一种或某几种社会因素，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是先秦时代总体文化机制的能动的产物。文人集团的发生与先秦时代的社会文化条件之间，存在着极其错综复杂的关系，这就像恩格斯所说的：“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而由此就产生出一个总的结果，即历史事变，这个结果又可以看作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①正是先秦时代的社会文化“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孕育和诞生了文人集团的原始形态。

文人集团的原始形态，即诸子百家的学术派别。作为诸子百家学派发生的文化机制，有两个“力的平行四边形”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在文化背景上，从学在官府到学在私家的剧变；在文化主体上，士阶层的崛起而起。诸子百家学派的产生，既是私学兴起的必然结果，也是士阶层群体自觉的集中表现。实际上，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种类型的文人集团的出现，都同学术的独立自主和文人的群体自觉息息相关，这也许就是文人集团原始形态的剖析所足以提供的文化意义吧？

^① 恩格斯·致约瑟夫·布洛赫·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462

第一节

“道术将为天下裂”

——从学在官府到学在私家

《庄子·应帝王》里记载一则著名的寓言，说的是南海之帝儵与北海之帝忽，一起到中央之帝浑沌那里作客，浑沌对他们备加款待。儵与忽商量，怎么才能报答浑沌的恩德呢？他们想到：“人皆有七窍以视听食息，此独无有，尝试凿之。”于是他们每天为浑沌凿一窍，七天以后，浑沌竟然呜呼而亡。

商、周时期的王官之学，官学、君师、政教合而不分，犹如浑沌本无七窍；至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散于天下，诸子各立一家，正如凿浑沌之七窍一样，王官之学不复存在，“道术”便不能不为天下裂了。《庄子·天下》生动地描写了这一古代“道术”由合而分的历史过程：

古之所谓道术者，果恶乎在？曰无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圣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于一。……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于本数，系于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于《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搢绅先生多能明之。……其数散于天下而设于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

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庄子·天下》将先秦学术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一、“无乎不在”、“皆原于一”的王官之学；二、“邹鲁之士搢绅先生”的《诗》、《书》、《礼》、《乐》传统；三、战国诸子百家之学^①。这正是从学在官府到学在私家的完整的历史过程。

学在官府，又称学术官守，意即学术文化统一于官府之中，所谓“政教合一”，这是商、周文化的突出特征。当时是官学的一统天下，无论是国学还是乡学，是天子王都之学（“辟雍”）还是诸侯都邑之学（“泮宫”），都与官府合而不分。

首先，学与政融为一体，官学是国家行政机构的有机组成部分，既从事教育，又进行政治活动。学校平时供学生学六艺、习礼乐，举行各种庆典，战时则在这里举行宣誓、献俘等仪式^②。

其次，更重要的是官师合一，学校教师必是在职的或退仕的官吏。如国家的重臣太师、太保、太傅，亦即帝王之师，人称太学三老^③。国学主持者大司正（大乐正）即国家礼官，同时负责宗教祭祀与国家典礼。下设教官乐师、师氏、保氏、大

① 侯外庐等：《中国思想通史》（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21~22

② 《礼记·王制》：“天子将出征，……受成于学；出征，执有罪反，释奠于学，以讯臧告。”

③ 吕思勉：《先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386

胥、小胥等，师氏、保氏为司徒之属兼主王室武备，其余皆为礼官之属。乡学则由乡师、乡大夫、州长、党正等行政长官兼管。正如章学诚在《校雠通义》卷一《原道第一》中所说的：三代盛时，无“不以吏为师”，所以“有官斯有法，故法具于官；有法斯有书，故官守其书；有书斯有学，故师传其学；有学斯有业，故弟子习其业。官、守、学、业，皆出于一，而天下以同文为治，故私门无著述文字。”

可见，学在官府虽然是“封建”国家土地所有制和氏族宗法制的产物，是社会中的智能阶层与权势阶层合而未分，社会分工不发达的表征，但是，它所显示的官学、君师、政教统一的特征，却构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原始形态，对几千年的中华文明产生了莫大的影响。后世的“天下以同文为治”虽然在形式上已迥非旧貌，但在文化内质上，秦朝以降的中国社会文化，不正是始终吸附在“天下以同文为治”的磁石之上吗？

当历史的车轮推进到春秋战国之际时，随着铁器的广泛使用，社会生产力有了长足的进步，土地所有制形式进入了私有化的过程，“私肥于公”的局面在列国相继出现。随之而来的，便是政权由王室而诸侯，由诸侯而大夫，由大夫而陪臣，氏族束缚的鸿沟渐形破坏，整个社会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诚如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所说的，战国乃“古今一大变革之会”。

“礼崩乐坏”的动荡现实，使官学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与经济下移和政治下移同步发展的，是学术下移。

春秋末年，官学已全面崩溃。据《左传·昭公十八年》记载，早在公元前524年，周大夫原伯鲁便坦然地承认“不说学”，即不喜欢到官学学习，并解释道：“可以无学，无学不害。不害而不学，则苟而可。”官学已经形同虚设了。与此同时，原来在周王室司礼乐的文化官员纷纷移居民间。如《论语·微子》记载道：“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